

兴建水利造就鱼米之乡



拖板桥

拖板桥，原址位于拖板桥巷东段（今双井路北段东侧）。元《至顺镇江志》载：“在今大军仓前，旧名浮桥。”

镇江古桥数以百计，即使现在运河上还存在七座，它们的桥顶皆为固定，而为何唯有拖板桥顶采取活动的方式呢？这一切都与南宋设立的国家级粮仓（转般仓）有着密切关系。

转般仓，系宋朝储运粮米的大型仓库。南宋伊始，宋金对峙于两淮，镇江成为军事后勤基地。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“以昔之置于泗、真者置京口”，即将北宋时期设在淮南的转般仓改置于镇江，依旧称转般仓。志载，此仓“前临潮河，后枕大江，即旧转般仓也”。转般仓四周环水，北面长江，南面漕渠，东面甘露港河道，西面护仓河，所有进出作业皆利用粮船上下。“诸路纲至，即令卸纳”。嘉定年间，所属粮仓增至七十四廩，可储米百万石，极大地提高了储存和转运的功能。

至于拖板桥，它位于转般仓中轴线上大门外，架设在穿城运河上，是粮仓与外界陆路联系的唯一通道，堪称为转般仓的一座门桥。桥为木结构，桥面浮搭，平日收起，有公务需要时再放开通行，故名“拖板桥”。

至元代，粮仓规模缩小，大半土地为民占用，拖板桥亦由粮仓专用桥变为公用桥梁。至顺二年（1331）重建，改为石桥。明代正统（1436—1449）中侍郎周忱重建，又名镇西桥；清康熙初，耆民高拱斗重修。民国时期桥废，湮没于地下。

2010年，在宋元粮仓考古中发现元代拖板桥遗迹。桥为单拱石桥，南北长35米、东西宽8—9米、桥拱跨度8.7米，因桥拱已被破坏，桥体仅存南、北两处桥墩以及残缺的桥拱石。桥墩底部打有成排的木桩，用以支撑桥墩三面墙体；桥墩内侧用碎砖及黄土夯实。桥体南北两侧现仅存部分当时桥面，桥面斜度20°，桥面中间条石东西向平铺，外围条石南北向平铺，部分桥面条石上保留有方形孔槽及车辙痕迹。

（刘建国）



对水的科学认知与利用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。

善为国者必先治水，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，到公元前3世纪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，再到被称为世界水利建筑奇观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必有城市的兴起、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崛起。

河姆渡遗址（距今七千多年）第二层发现的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，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。这个发现意味着，我们的先民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管理水的能力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聚居在今日句容丁沙地遗址（距今七千年左右）的原始先民，就已懂得在村庄外围挖掘壕沟，以防兽害及外氏族的入侵。在马家浜文化时，居住在太湖南岸的湖州邱城遗址（距今六千多年）的先民，已开凿了小型渠道，把水源引进住地，以便饮用洗涤。

水井的普遍使用，对农业的旱涝保收与定居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。位于宁绍平原，具有高超木作技术水平的河姆渡先民早已熟知在村落中“凿井而饮”，并构筑木材为井框，以防泥土塌陷其中。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，水井的开凿已较普遍，这在苏南的常熟、无锡、吴江、吴县、江阴、昆山和浙江的嘉善和上海青浦等地都有发现。

水是吴文化发展的自然基础，水利是吴地发展的命脉。水利治理工程的好坏，不但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反映，更是王朝盛衰的一大标志。

水路是古代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，说到运河，我们会想到苏伊士运河、巴拿马运河。与这些运河相比，中国古人开凿运河的历史要早得多。位于江苏省无锡境内的伯渎河是中国历史上开凿的第一条人工河流，具有3200年历史。流经坊前、梅村、荡口，直至漕湖，全长43公里，是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运河。传说，泰伯奔吴定居梅里后，“穿浚渎以备旱涝”，大力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，率民众在今苏州、无锡间开凿了这条农田灌溉总渠，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。三千多年来，伯渎河就像母亲，默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

吴地人民。

西周以降，吴国的统治中心主要在宁镇地区。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不但便利交通，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，因此，治理水患、防旱排涝、保境安民，成为吴国统治者的重要工作。

江南并非天然的鱼米之乡，太湖平原之所以后来发展成为“肥饶水绝”富庶的粮食基地，除因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，当同先秦时的吴国及至越、楚、秦等国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分不开。吴地曾多次遭遇海侵水扰，外灌内涝，造成汪洋泽国、地毁人亡。面对太湖流域的洪涝灾害，千百年来吴地人民不畏艰险与自然天灾作斗争。

连接太湖和长江的胥溪，沟通江淮的邗沟，贯穿太湖平原的江南运河，连接苏州和周边地区的常熟塘、吴江塘，常州的孟渎等一个个水利工程形成的江南运河网络，既抗旱又防涝，大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，实力助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，为吴地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水利还关系到国家安全。发现于2005年的丹阳葛城，经专家论证，为西周至春秋时吴国早期城垣遗址。城址内分布有窖穴、房基、水井、水沟，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。葛城的形制很独特，水和城环环相套，从内城往外走，越过8米宽的壕沟，就是60米宽的外城，城外又是一道壕沟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层水环绕两层城。专家们根据种种迹象推测，葛城可能有三层水三层城，总面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。这种水环城、城环水的结构和常州的春秋淹城一样，但葛城的内城比淹城时代更早、规模更大，说明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开发利用水利资源。

根据镇江丹阳周边遗址推测，葛城遗址可能是吴国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，在宁镇地区到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，建立的重要政治中心，可能是吴国早中期的都城城址，也是迄今为止，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、延续时间最长、保持较为完好、内涵较为丰富的吴国古城。葛城遗址对于江苏商周时代考古及吴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，2013年5月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兴修水利，便利了交通，发展了农业，带动了工商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，“因水成市、枕河而居”的空间格局形成了江南传统乡村特有的水网格局。

（张剑 马彦如）



葛城遗址

镇江评话版历史故事—— 寄奴正传（二十二）

范德平

桓振夺回江陵，总算报了个疤。不过这刻桓家的势力也就局限于荆州一带，所以桓振气鼓唠叨感叹：“桓玄当日不任用我，导致这个下场。假若公还在，我当前锋，天下就大定了。现在只占有江陵，哪块是归处啊？”此时刘裕的西征大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照理桓振、桓谦应当尽早谋划才对。但是他们纵情酒色，又肆意诛杀，不少人倒了霉运。

麻里木油的刘毅等西征将领泊船夏口庆功宴一场接一场，个个喝得酒醉洋乎，把桓振和桓谦的事忘得狗六大干净，陡然听说桓氏又重新夺回江陵，吓得一身冷汗，赶紧重整旗鼓。刘毅率部先是拿下巴陵，把那个散布假消息的王稚徽杀了。随后，何无忌、刘道规二将在湖北马头、龙泉打败桓谦和桓蔚。西征军连战连胜，刘毅、何无忌不由地飘飘然起来，要直取江陵。倒是刘裕同父异母的老弟刘道规在军事谋略上有滴咯眼头见识，他认为：兵法屈伸有时，当下应鸣金收兵，用围而不打的办法牵制桓军。刘毅、何无忌不听道规苦劝，执意扣打江陵，果然在灵溪被桓振和冯该合围击败，折损将士数千人。刘毅、何无忌等人向刘裕请罪，刘裕嘎闷解了刘毅青州刺史官职。

一次失败并没有动摇刘裕平定诸桓的决心，他让刘敬宣在寻阳聚集粮草打造战船，充实西征军的实力。404年十二月，刘毅、何无忌和刘道规又重新西上讨伐桓家军，一路凯歌。因刘毅号令严明，军纪整齐，所到之处使得百姓安居乐业，刘裕重新封他为兖州刺史。晋军西征连战连胜，只是苦了荆州各郡的太守，不晓得该向到谁，早晓得这杠子，风向不该转得这么快啊……

当时桓谦劝桓振率兵出战，自敢留守江陵，但因桓振向来轻视桓谦而没有听从。晋军很快反攻江陵，桓谦弃城出逃，西征军成功收复江陵。405年正月，桓振挟持着晋安帝到江津，派使者谈判，要求东晋割让荆、江二州，以换取晋安帝，刘毅一口回绝。桓振闷得，晓得事情整歇。桓谦与桓怡、桓蔚、何澹之及温楷等人投奔后秦。

这刻，刘裕心头想：西去江陵接驾事不能再瞞了。405年二月初五，他准备了安帝专用的车驾和仪仗，刘毅、刘道规留在夏口城驻军，何无忌负责护卫安帝沿江东下返回京城。

三月，司马德宗被迎回建康，在遭废黜一年多后重登皇位。司马德宗下诏说：“我孤陋愚昧，命运不济，遭遇大祸。叛贼桓玄，乘机制造事端，穷凶极恶肆意妄为，欺诳国人，诬蔑人主，犯上作乱，篡夺皇位。英才刘裕忠心耿耿，神武命世，选贤任能，恪守信义，忠义之士云聚他的麾下。他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，老天有眼佑我晋朝。”参加京口建义光复晋室的诸将，都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各得其所。刘毅为青州刺史、何无忌为琅琊内史、孟昶为丹阳尹、刘道规为义昌太守、魏咏之为豫州刺史、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。

推翻桓玄，刘裕立了头功，成了光复大晋江山的英雄。骨子里头，东晋王朝已经离不开他了。不过刘裕一肚子数，那些士族门阀嘎嘎嘎，对他这个寒门武将，还有滴咯不大服气。这刻儿他乐得卖卖关子，做出一副低调的架势。安帝给了他那么多官衔，他坚辞不受。加封为录尚书事，又不受，三番五次请求回到自己的属地京口。天子不许，派百官恳劝，又屈尊亲临刘裕在建康的府第。安帝对刘裕说：“我这个帝位是你抢回来的，你的功德，我永记在心头。”安帝生怕刘裕不在身边，再冒出什么无二八鬼的乱贼来。刘裕惶恐，谢恩之后，说道：“我是真心想回老家，好在京口建康几十里地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当火速前来。”安帝见刘裕归心似箭，只好暂时应允。

当月，刘裕回到京口，镇守丹徒。这是刘裕在人生棋局中下出的一招“妙手”，这杠他既远离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，又牢牢掌控着兵权制约朝廷，这种人日后怕的是不当皇帝都不行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